

陶渊明——中国文化传统上和谐的典范^{*}

赵治中

(丽水学院人文学院,浙江丽水 323000)

摘要:陶渊明与社会和官场能平和共存,与友朋和亲人和好相处,行为与内心平衡相安,与自然浑融相剂,堪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学传统上和谐的典范人物。

关键词:陶渊明;平和共存;和好相处;平衡相安;浑融相剂;和谐典范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749(2008)03-0001-05

Tao Yuanming: The Most Harmonious Epitome of Chinese Cultural Convention

Zhao Zhizh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tudies, Lishui University, Lishui Zhejiang 323000, China)

Abstract: Tao Yuanming coexisted peacefully with the community and officialdom, got along intimately with friends and relatives by well balancing his personal behavior and mind and by merging himself integrately into the nature. He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most harmonious epitom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literary convention.

Key words: Tao Yuanming; coexisting peacefully; getting intimately along with; balancing well; merging integrately; harmonious epitome

在《爱好人生者:陶渊明》一文中,林语堂盛赞:

陶渊明这位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和中国文化上最和谐的产物,不期然而然地浮上我的心头。陶渊明也是整个中国文学传统上最和谐最完美的人物^{[1]125}

事实上,陶渊明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学“最和谐的产物”,而且堪称为典范人物。可惜的是论断虽有,却未很好阐发。其中有些阐述,如:

陶渊明代表一种中国文化的奇怪特质,即一种耽于肉欲和灵的妄尊的奇怪混合,是一种不流于制欲的精神生活和耽于肉欲的物质生活的奇怪混合;在这奇怪的混合中,七情与心灵始终是和谐的。……陶渊明的心灵已经发展到真正和谐的境地,所以我们看不见

他内心有一丝一毫的冲突,因之,他的生活也像他的诗一般那么自然而冲和。^{[1]125-126}

宣扬“奇怪混合”论,如从天使与魔鬼的“耽于肉欲和灵的妄尊”角度来说,则颇有些玄乎;如说的是人的物质与精神,即正常的生活需求与高尚精神境界的结合,倒可理解。述说“七情与心灵始终是和谐的”、“看不见他内心有一丝一毫的冲突”,却是与陶渊明的实际不符。诗人也遇到过困境,甚至有过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由于他善于化解与从容应对,困惑得以解脱,思想得以超越,最后才取得与社会的和谐,与他人友好共处,身心平衡相安,与自然浑融相剂。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和谐指的是个体与社会、个人和他人、自身外在的生活方式与内心世界、人与自然能平和

* 收稿日期:2007-12-17

作者简介:赵治中(1936—),男,浙江缙云人,教授,“陶渊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共存,和睦相处,身心平衡相安,物我浑融。在这些方面,陶渊明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

一

人类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任何人都不能真正独立于世界之外,离开现实社会而生活,离开历史的发展而生存。陶渊明自不例外,也生活在现实社会之中,与社会和官场构成一定关系,并要处理好种种关系,如:积极用世与丑恶现实的矛盾、个人与官场及官僚的矛盾、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矛盾。

作为没落庶族地主出身的陶渊明,自幼就接受儒家教育与道家思想的影响。陶渊明“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运行”(《拟古九首》)的豪侠热血,青年时佐君立业、治国安邦、“大济苍生”的功业壮志,“猛志逸四海,蹇蹇思远翥”(《杂诗十二首》)的义勇豪气,使得诗人积极入世,很想为天下干一番事业。但是,晋王朝内忧外患交并,政治危机四伏,局势异常混乱,玄风畅行,释道昌盛,仕途险恶,文人命蹇。陶渊明的壮志与豪气、建功立业的愿望,与动荡的社会、黑暗的政治产生了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然而,诗人并不乱闯蛮干,瞎碰硬撞,而是“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或击壤以自欢”(《感士不遇赋》),终以宁静的志趣化解了外在的矛盾与内心的冲突,超然事外地在农村读书和躬耕,过着洁身自好的生活,以求心灵欣豫自适。陶渊明养志以待时,对社会仍有所期待,处世态度还是积极的。

壮年时期,陶渊明迫于生计,也为实现夙志,曾多次出仕。出仕期间,陶渊明在官场与官僚、政客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期间,诗人就碰到为贫而仕与“质性自然”的矛盾、折腰与守节的冲突。

29岁时,陶渊明因“亲老家贫”,曾出任州别驾祭酒。由于职事鞅掌,矫厉逆性,而上司王凝之出身于门阀世族,又是愚顽的道教徒,狂热而自负,在其门下诗人自然的质性得不到张扬,与官场社会的奉迎拍马作风势必发生冲突。陶渊明“禀气寡所谐”(《饮酒二十首》),“不堪吏职,少多日,自解归”,以离职来化解矛盾。在家中幽居期间,“州召主簿不就”,诗人宁可“躬耕自资,遂抱羸疾”^[2],避开可能产生的矛盾。后来,由于桓玄有建立勋业的抱负,一度又成为讨伐司马元显的盟主,陶渊明于35岁出任桓玄参军。参军一职,虽能参与机要,还有颇多的升迁机会,但随着桓玄私欲的膨胀与杀夺篡位野心的暴露,诗人又于37岁那年冬天借母丧而离开桓玄。“聊为垄亩民”,陶渊明暂时避开混乱的时局与倾轧的官场。40岁的陶渊明,原以为刘裕可挽救晋室,故附义旗而起,出任镇军参军。刘裕打着讨桓玄的旗号,任人唯亲,翦除异己,阴谋篡晋,又引起诗人厌恶,以至心存戒惧。任职不足半年,陶渊明又远离刘裕而归田。41岁,诗人再入刘敬宣幕。“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又因上司辞职而再度离

开了军幕。

陶渊明出任彭泽令,一为“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二是亲故“多劝”;三是叔父的推荐。由于诗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终于在郡遣督邮之时解印挂冠,“守拙归园田”:

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缁袍之为耻。(《感士不遇赋》)

对于黑暗的政治与混乱的政局,晋朝不少士人好走极端:“通脱一过分,那便就形成对于传统事物概行反抗的看法了。这么一来,人间是狂乱的……服用五石散那样奇怪的药,披散着头发,乱穿着衣服,现出逸出常轨的行为”^{[3]30}。而陶渊明对王朝与军阀,既不能像嵇康那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每非汤武而薄周孔”^[4],也不愿像山涛、向秀那样深陷世俗之中,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成为“俗物”,而是选择了一条辞官归田的道路。正如李泽厚所指出:

陶潜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性退避。……所以只有他,算是找到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径。无论人生感叹或政治忧伤,都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爱恋中得到安息。陶渊明在田园劳动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5]

又是“政治性退避”,化解了陶渊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与官场的对立,结束了“为人所羁”、“违己交病”的屈辱生活,求得“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实现了人生价值的转换,寻求一种更高的生命境界。

辞官归田以后,陶渊明靠躬耕自资而生活,与上层社会接触少了。此后,诗人家境每况愈下:44岁庐室遇火灾,以后浔阳又连遇兵燹;50岁以后痼疾加剧几乎病死,又碰上“炎火屡焚如,螟螣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自然灾害,生活已有些困苦;“老至更长饥”,陶渊明晚年更是陷于馁饿困境,得靠借贷度日。出于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与失望,陶渊明构筑了桃源理想:

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收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桃花源诗》)

陶渊明在汲取老子的“寡民”、孟子的“王道”、庄子的“同德”、墨子的“自食其力”、《礼记》的“大同”世界、伪《列子》的华胥国的理想,又发展了阮籍、鲍敬言的“无君”、“无臣”思想,借助于田园生活的实景,再经诗人心灵的点化与理想的洗涤,创造出一个没有战乱、没有王权、没有赋税,人人劳动、平和安乐、自足适性,人与自然共生、和谐共处的理想社会。

在这个世界中,和平代替了战争,宁静代替了纷

器，富裕代替了贫困，淳朴代替了智慧，诚实代替了虚伪，欢乐代替了苦恼。^[6]

这是一个十分和谐而欢愉的社会：人与社会协调，人与人和悦相处，心不“劳智慧”，体不疲惫，人与自然共生共荣。陶渊明在现实社会中寻觅不到社会的和谐，就在心灵中构筑桃源理想，用来对照现实的缺陷，让后人在理想社会的激励下克服或改变现实的不和谐。

从年轻时的养志待时，中年时的退避官场，到晚年的构筑桃源理想，陶渊明理智地化解了个人与社会的种种矛盾与冲突，终于能与社会、官场平和共处。

二

尽管一生活活动范围不大，经历也不复杂，陶渊明也还是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其中有在职官僚、退职小吏、地方绅士、高僧隐士、诗朋文友、田夫野老，以及家人子女等，与他们构成不同的关系。

官场人物中，除前面已谈及的几位上司外，尚有王弘与檀道济。王弘曾任江州刺史，对陶渊明是“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后来，王弘先遣人于半道置酒邀诗人引酌，自己再前来相见，“遂欢宴终日。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潜便于座申脚度焉”^[2]。“称疾不见”，这表明陶渊明交友讲原则而不苟且；接受宴请与馈赠以济穷，又表现出诗人的圆融品性。尽管两人“逝止判殊路”，陶渊明也虚与委蛇，犯不着与之绝交，当面给王弘以难堪。

檀道济继王弘任江州刺史，对陶渊明也极敬仰，曾登门造访，规劝为官。诗人因政治见解和人格品性与檀有歧异，对其政治说教则以“何敢望贤，志不及也”而婉拒；“馈以梁肉，麾而去之。”^[7]诗人并不因为不耻檀之所为，而采取过激的行为。

颜延之和渊明交往频繁：“深心追往，远情逐化……伊好之洽，接阎邻舍。宵盘昼憩，非舟非驾。念昔宴私，举觞相海”^[8]。颜先留钱二万给陶，陶死后又为之作《诔》，可见两人“情款”，交谊深厚。

高僧慧远与渊明时相过从，曾有“虎溪三笑”故事流传。一次，慧远答应他人莲社可破例饮酒。渊明终因其宣扬“神不灭”论和因果报应的教义，以及人生态度不同，而“遂造焉，忽攒眉而去”^[9]。慧远可以成为陶渊明方外之交，但陶与他始终保持距离，显得有些隔膜。陶既不皈依佛教，又避免与慧远作正面冲突。

陶渊明与周续之、刘遗民号称“浔阳三隐”，表明他们形迹类似，思想相通。但渊明与他俩的人生道路与思想倾向有别：周先“入庐山事释慧远”，后又出任，还应檀道济邀请去城北讲礼校书。渊明曾因他“不应辟臣命”，引之为“意中人”；又因为他“身为处士，时践王庭”^[9]，曾写诗微讽，并规劝他“从我颖水滨”。最后，终因“路邈”，心灵彼此阻隔。刘遗民是先“遁迹匡山”，后又讲禅。陶渊明只是归田，“不应征命”，既非隐士，又不信佛禅。然而，这些并不影响他们彼

此相交，颇有情谊。

在渊明的诗朋文友中，有退职官吏、地方绅士，如庞主簿、丁柴桑、戴主簿、郭主簿、羊长史、张常侍、殷晋安等。因其“合志同方，营道同述”^[10]，性情相投，生活相近，他们常以诗文相酬唱。

陶渊明与田夫野老，虽有阶级出身的差异、文化教养和生活习性的不同，会存在着某些隔阂，但由于诗人能坦诚待人，平等相处，与他们频繁交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五首》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移居二首》

共话农事，相与回家，闲时相思，更邀饮酒。他们之间关系融洽，情谊纯朴，真挚深厚。

“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杂诗十二首》对待家人，渊明是敦亲睦族：父早逝有“望瞻勿及”之叹，对母亲是“一欣侍温颜”，真是事亲至孝；又十分友爱弟妹。从《祭程氏妹文》和《祭从弟敬远文》等文章中，看出他们平日关系融洽，友谊深厚。

渊明与妻子的关系，尽管有过“室无莱妇”之叹，妻子也会因为生活艰难而埋怨丈夫，但从“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7]、“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11]，可知他们是志同道合，节操相类，做事配合，当属伉俪情深，琴瑟相调。对于子女，渊明是舐犊情深，和蔼慈祥：“既见其生，实欲其可。”《命子》生子之喜悦与期待之殷切，溢于言表。“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儿子贪玩懒耍，学业无望，诗人虽有责备，亦充满爱恋。“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责子》尽管有些无奈，渊明还是直面现状，达观地处理望子成才与诸子不才的矛盾。

龟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苦何可言。《与子俨等疏》

子女生活艰难，陶渊明“固为子女忧”，且深为自责。因笃于天伦，怜子心切，诗人可以化解对儿子的埋怨与责备。

陶渊明自少接受儒家“仁民爱物”的学说，汲取墨家“兼爱”的主张，还受佛家慈爱为怀的影响，故具有仁者的襟怀和达士的胸次。正因为如此，诗人才能在诫子书中提出“四海皆兄弟”的训诫，在送一力给其子时有“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2]的仁慈嘱咐。有仁者的襟怀和达士的胸次，陶渊明自然会善待各类人等，与他们和睦友善，友好相处，和谐发展。

三

在人生历程中，每个个体与自身也构成一定的关系，此外在行为与内心世界也会产生矛盾与冲突。

在世族地主掌权当政的时代，陶渊明直到29岁才入仕。而自少养成的田园情趣，使诗人与官场虚伪拘谨的作风产生尖锐的矛盾与激烈的冲突。为了生计和理想，陶渊

明出仕而进入官场。在官场上,他有“为人所羁”的烦恼与“与田园疏”的无奈,故“少日,自解归”。行役在外,“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驱役无停息,轩裳逝东崖”(《杂诗十二首》),“怀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辛丑岁七月……》)。风尘扑扑,奔波不停,使诗人叹行役、倦宦途。“日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始作镇军经曲阿》)在官场生活几年以后,陶渊明终于认识到“林园无世情”与恶俗,只有辞别“人间”(官场)回到“山泽”才能保全自己淳朴的性格和自然的本性。

后来迫于生计,陶渊明再度出仕。可终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归去来兮辞·序》),还是诀别了官场,结束多年“一心处两端”的羁旅生活。“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归园田居五首》)田园山林是诗人理想的生活场所,美好的精神家园。故一回到田园山林,陶渊明便似找到人生的归宿,就能结束“为人所羁”的烦恼,产生“复得返自然”的欣喜,获得身体的自适与心灵的自由,身心平衡相安。

在生计方面,陶渊明出生后家道中落,家境贫困: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

少而贫病……藜藿不给,母老子幼,就养勤匮。……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纆纬萧,以充粮粒之费。”^[6]

壮年以后,陶渊明生活状况也没有转好,经常叹贫哭穷:

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饮酒二十首》)

辞官归田以后,诗人物质生活仍是困窘的:

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咏贫士七首》)

到了晚年,陶渊明更是陷入生活难以为继的绝境:

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

怒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有会而作》)

诗人穷到靠借贷度日,最后是“偃卧瘠馁有日”。

“贫富常交战”,作为庶族地主出身的陶渊明,受到如此生活的煎熬,他心怀悲凄而不能平静。然而,诗人是“道胜无戚颜”(《咏贫士七首》),安贫若素。“道胜”者,是指他以道家的“抱朴守真”和儒家的“固穷”节操作为精神支柱。他“甘贫贱以辞荣”：“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癸卯岁十二月……》)因而对物欲要求甚低：“御冬足大布,粗纁以应阳。”(《杂诗十二首》)“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饮酒二十首》)“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二首》)故能“无戚颜”：“环墙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箠瓢屡空,晏如也。”(《五柳先生传》)

“固穷夙所归”(《有会而作》),固穷作一种道德操守与人格凝聚,使陶渊明在困境中能从容应对饥寒,心甘情愿地过着清贫的生活。固穷不仅坚定了诗人贫居依稼的生活态

度,而且使他在生活煎熬中有悠然自得的豁达气度。

生死障碍,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和逾越的。“夫死生得失之大者,故乐莫甚矣,哀莫深矣!”^[12]乐生惧死,亦人之常情。汉末魏晋时期,由于政治的黑暗与社会的动荡,人生短暂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对人生的空幻和对死亡的惶恐,已成为时代的典型音调。

陶渊明“也不能忘掉死”^[13],不隐瞒自己对死亡的恐惧与忧虑:“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对年华及衰与身后空无,诗人“常恐”与“心焦”,颇有几分无奈与苦涩。“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酬丁柴桑》)面对死亡威胁,渊明不免萌生及时享乐的想法:“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己酉岁九月九日》)“命室携童稚,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浊酒自陶,命室远游,都是诗人为消释生命焦虑而作的努力。

聊乘化以归尽,乐乎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有生必有死,早终命非促。“《拟挽歌辞三首》”陶渊明由于受到老庄思想与玄学自然观的影响,认识到生命并不神秘,而是一种自然现象,一个自然运行过程,其规律是无法抗拒与改变的。因而,诗人能直面人生,正视死亡,超越生死与寿夭的界限。

“形迹凭化迁,灵府常独闲。”(《戊申岁六月月中遇火》)“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三首》)陶渊明顺应自然,以委运任化的自然哲学来解脱生死问题的困扰,消弭对死亡的恐惧,表现出特别放旷明达、静穆坦荡的态度,超越了当时的士人和后世的封建文人。故梁启超才有如此论断:

若文学家,临死时,从从容容,视化如归,临凶若吉的留下几篇有理趣之作品,除陶渊明外象没有第二位。^[14]

面对出仕与归田、贫困与固穷、命促与惜生,陶渊明都能不以出处劳形,不因贫贱忧心,不因命促焦虑,能化解面临的种种矛盾,消释心理的冲突,最终获得心境的宁静,生活的谐和。

四

人与自然,是人类与外部世界的最基本关系。自然是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劳动实践的对象,因而,人类的命运始终与自然的存在和发展休戚相关。人类是生物进化的产物,也是自然的存在物(又属社会存在物)。它的一切都来自于自然,受自然力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人类与自然虽有区别,却始终相互依存的。

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与知识水平低下,人类无法解释自然现象及其变化,对自然常常因畏惧而顶礼膜拜。神秘的自然似与人类对立,原始文学中的物我也是两立的。先秦时期,自然逐渐为人类所认识与利用,人们开始摆脱神秘主义传统而迈入价值论系统。这时期的文学,开始把自

然当作劳动和生活的背景,或当作比兴的媒介与引发感情的工具,或作为道德的比拟与精神的象征。这时期的自然与人类虽不再对立,但仍然是相分离的、不平等的。徐复观曾指出:

自然向人生发生的比兴的作用,是片断地、偶然地关系。在此种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占有明显的地位;所以也只赋自然人格化,很少将自己自然化。^[15]

汉魏以来,自然已被看成客观整体,开始由外在世界进入人们视野,客观物体为人们所观赏,成为“寻访”、“散怀”与得“道”之所,人类与自然进入双向交流、平等对话的阶段。

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陶渊明、谢灵运……对于自然有那一股新鲜发现时身入化境浓酣忘我的趣味;他们随手写来,都成妙谛,境与神会,真气扑人。^[16]晋代士人以虚灵的胸襟欣赏自然,既发现自然美,又寄于自然物以深情,这使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入到了物我契合、天人合一的境界。

陶渊明从爱好自然到心甘情愿地转向自然,并把整个身心都寄托到自然,自然成了诗人主观生命情调的投射对象,进而使诗人与自然对接,心灵与造化冥合。陶渊明与自然的关系,确已进入了一个冥合浑融的新境地。

陶渊明笔下的自然,当以围绕田园生活、吟咏田园美景、洋溢田园情趣的作品最多。田园作为乡居之自然,给诗人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和调节心理的场所,因而陶渊明对它倍感亲切,认为它可居可乐。

山水,是人们游赏的场所,诗人行乐的自然。陶渊明从中感受到山林泉泽的优美,自然生态的和谐。

山涤余霏,宇暖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载欣载瞩。《时运》

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鸱。迴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游斜川》

陶渊明笔下是山川旷远,境界澄净,新苗欢舞,游鱼自驰,鸣鸥翻飞,峰峦迭翠。和谐的自然山水,让诗人“游目”称心,读者从中感受作家温厚的襟怀。

四时节候和晴雨朝夕等自然现象,陶渊明也作了正面描写。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拟古九首》

自然现象被诗人发掘出美来,并加以情趣化与人格化的描写,使其变得鲜活而富有生命,让人感受到诗人对自然之亲切,诗人与自然的浑融和谐。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陶渊明最早把自然作为独立的审美观照对象和艺术表现的主题,是他将田园山水引进诗歌的领域,使其有了自己的空间与美学价值,因而赢得“自

然诗人之宗”^[17]的美誉。

更为重要而突出的是,陶渊明“把田园山水作为精神的故乡和灵魂的归宿,使自我与自然浑融回流、默契相安。在主体和客体的和葛、人格与自然的合一方面,陶渊明堪称古代作家的楷模”^[18]。

朱光潜在《陶渊明》一文中,深刻地阐明:

打破了切身利益相关的小天地界限,他的世界中人与物以及人与我的分别都已化除,只是一团和气,晋运周流,人我物在一体同仁的状态中各徜徉自得……他把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使外物的生命更活跃,情趣更丰富;同时也吸收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大自己的胸襟气韵。^[19]

陶渊明已化除物我之间的区别,达到人、我、物在平等自由之层面沟通的境界。既由心及物,我化于物,将自己的胸襟气韵“贯注”于外物,又由物及心,物化于我,“汲取”外物的生命与情趣来扩充自己。这种物我契合和谐、浑融回流相剂的境界,是时人和后人都难以企及的。

参考文献:

- [1]林语堂.生活的艺术[A].香港:金兰文化出版社,1986:125-126.
- [2]晋书·隐逸传[M].
- [3]竹田复.中国文艺思想[M].台湾:龙门书店,1944:30.
- [4]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M].
- [5]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129-130.
- [6]程千帆.俭腹抄[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210.
- [7]萧统.陶渊明传[M].
- [8]颜延之.陶征士诔[M].
- [9]佚名.莲社高贤传[M].
- [10]《礼记·儒行》[M].
- [11]南史.隐逸传[M].
- [12]陆机.大暮赋[M].
- [13]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1956:395.
- [14]梁启超.陶渊明[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
- [15]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6]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15.
- [17]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238.
- [18]赵治中.陶渊明论丛[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61.
- [19]朱光潜.诗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4:269-270.